

ranslation

# 翻译 教程

陈清贵 杨显宇 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翻译教程

第二版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翻译教程

主 编 陈清贵 杨显宇

副主编 石发林 廖志勤 罗能全

编 者 曾 绪 王金龙 熊婷婷 敬万秋

甘成英 贾 敏 聂 翔 刘 勤

权 巧 任月花 陈 宁 高庆华

胡志国 范 波 王金梅 简乃贵

高 阳

主 审 瞿德元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教程 / 陈清贵, 杨显宇主编.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9  
ISBN 7-81114-255-4

I.翻... II. ①陈... ②杨... III. 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0434号

## 翻译教程

陈清贵 杨显宇 主编

---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责任编辑: 江进优 殷 红  
发 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成都火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开本 1/16 印张 12.25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6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14-255-4 /G·84  
定 价: 24.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 (028)83201495 邮编: 610054。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主 编 简 介

**陈清贵** 四川三台县人，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省第六批学术及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绵阳市优秀教师、四川省优秀翻译工作者。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古代女性诗人诗词翻译理论研究。近年来出版各类主编教材、专著、译著16种，发表论文30余篇，参与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省级课题5项，并获教育部项目评审优秀奖1项，省、市级奖励2项。

**杨显宇** 四川绵阳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西南师范大学英语硕士研究生班结业。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市场经营战略管理，特殊用途英语(ESP)。

# 前 言

## 编写背景

翻译学的建设和发展在近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翻译理论与实践呈现繁荣之势。翻译学各个层次的系统建设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翻译学建设的重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基础，它关系着翻译学学科建设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生源和质量，关系着翻译学这门年轻的学科的发展。系统研究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将依赖于翻译教学工作者的不断的积累经验和深入研究、规划和实践。

本书编者大多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有的从事高年级的口译、笔译教学多年，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积累。有的长期从事大学英语教学，对教学规律有充分的研究。近年来，在翻译教学过程中编者使用的各种教材有十余种，使用的参考书亦不少。在使用过程中，感觉这些教材各有千秋、各有所长：或注重翻译技巧的训练；或注重翻译知识的系统化；然而在对教材的处理中总感不足。主要表现在：教材使用对象和层次不分明；重点不突出；教材内容与课堂教学处理难以把握；教材与英语专业对翻译教学的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联系缺乏关联，教材的针对性、实用性不强等。这直接促成我们在较长时间准备的基础上编写这本有一定针对性的教材。同时，最近几年编者所在外国语学院学科建设发展很快，该教材也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学院学科建设。该教材的编写得到编者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通过立项，该教材成为西南科技大学首批教材建设重点项目。

## 教材特点

本教材在研究现有教材基础上，结合编者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研究，重点突出以下特色：

1. 力求体现教学改革成果，反映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教材体例和内容能很好地服务于学生能力和个性、才能的全面发展；

2. 教学内容有利于减少教师讲授比例，给学生留出更多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

3. 本教材是编者长期从事翻译学系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将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研究成果集中翻译在教材内容中。教材将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教学中同时体现了编者的研究成果、学术思想和主张。并且在教程中加入“翻译问题探讨”，一方面体现编者一贯的主张，即“本科学生学习翻译时还是要学一些理论知识，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另一方面，也通过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开阔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为热爱翻译的同学继续学习打下基础。

4. 翻译练习以散文为主，又尤以汉译英为重，题材范围覆盖广，设置的练习有一定难度，但翻译及翻译讲解点较多，便于任课教师处理。同时，在交流平台上大量由浅入深的练习可供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选择使用。

5. 将书中翻译练习参考答案以及其他丰富的翻译练习放在互联网上，并建立一个交流平台，使教材使用者能通过这个平台获取信息，并进行互动交流，使教学活动真正从课堂向课外延伸。

编 者  
2006年7月

##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的历史.....	1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概述.....	1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概述.....	5
第三节 翻译的本质.....	7
翻译练习.....	10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	14
第一节 关于翻译标准的不同论述.....	14
第二节 严复的“信、达、雅”及其评判.....	16
第三节 林纾的翻译及“林译小说”的历史地位.....	20
第四节 翻译的一般标准.....	22
翻译练习.....	25
第三章 翻译的过程.....	29
第一节 翻译的难点.....	29
第二节 对译者的要求.....	31
第三节 翻译的过程.....	33
翻译练习.....	37
第四章 翻译技巧.....	42
第一节 择字与推敲.....	42
第二节 增减与拆合.....	47
第三节 正说反译与反说正译.....	55
第四节 重复法.....	58
第五节 词类转译法.....	62
第六节 长句的翻译.....	65
第七节 习语的翻译.....	74
第八节 语篇翻译.....	79
第九节 语义翻译.....	84
第十节 诗歌的翻译.....	94
翻译练习.....	112

---

<b>第五章 实用文体翻译</b> .....	115
第一节 广告翻译.....	115
第二节 新闻文体翻译.....	125
第三节 科技文体翻译.....	135
第四节 合同翻译.....	145
第五节 戏剧翻译.....	146
第六节 旅游翻译.....	152
第七节 网络辅助翻译.....	156
翻译练习.....	169
<b>第六章 翻译问题探讨</b> .....	173
第一节 译者有无自己的风格.....	173
第二节 “宁信而不顺”还是“宁顺而不信”.....	177
第三节 译者究竟“忠实”于谁?.....	179
第四节 跨文化翻译的策略:是“异化”还是“归化”?.....	181
翻译练习.....	182
<b>参考文献</b> .....	186
<b>后 记</b> .....	189



# 第一章 翻译的历史

##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概述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据文字记载，早在周代就有了翻译活动。夏商周时期，人们之间的通达十分频繁，许多不同的民族和部落居住在同一块疆域内是十分普遍的。据《左传》记载，仅在周朝领土上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蛮子等十多个部族。这些不同的部族与居住在中原的华族在语言、饮食、风俗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族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华族要与诸多异族交往，就必须要有翻译。在《周礼》、《礼记》两书中均有周朝翻译官职的记载。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了周代的口译：“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自雒。”象，即指翻译官，后专指译南方语言的翻译官。《礼·王制》中说：“中国，夷、蛮、戎，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除“译”之外，“寄”、“象”、“狄鞮”均为翻译官。

西汉人刘向在《说苑·善说》中记载了鄂君子皙请人翻译《越人歌》一事，是我国较早关于笔译的记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有白狼王唐写的《慕代诗》三章，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列传》不仅记载了这三首诗的作者、译者姓氏，而且还保存了这三首诗的原文汉字注音。这是我国的诗歌翻译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汉代起，由于在政治、军事上与北方交涉频繁，“译”逐渐成为了总称。“翻”字也从东汉起使用。在南北朝时期的佛经译著中已开始使用“翻译”二字。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翻译的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东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第二个时期是明末清初的自然科学翻译，第三个时期是近代的文学翻译，第四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这四个时期留下的丰富的译学思想和翻译资料，为现、当代翻译学奠定了基础。

### 第一个时期

佛经翻译的起源，各说不一。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刘欣时期的《浮屠经》当为我国最早的佛经译本。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则始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译者有安息（即波斯）人安清与西域月支人支娄迦谶（支谶）。安清，字世高，天资聪颖，笃信佛教，精于西域语言且通晓汉语，译有《大安般守意经》等35部经书，开后世禅学之源，被尊为中国

译经的先驱者。所译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翻译之首。”（梁皎慧：《高僧传》）支娄迦讖（支讖）和他的弟子支亮及再传弟子支谦都博学多闻，以翻译佛经闻名于世，当时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说。支谦不仅译经多，而且对翻译理论有精深的研究。其所著《法句经序》是现存最早的翻译理论文字。文中提出了“文”与“质”两种对立的翻译观，并对质派观点作了细致的阐述。

中国第一位本土翻译大家及翻译理论家当推道安。道安（314—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今属河北省）。他组织翻译了《阿含》与《阿毗昙》及其它经书 14 部 187 卷，100 万余字，还厘定了翻译文体。道安还创造性地总结了翻译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即认为前代译经有五种改变原梵文经书的表达方式的情况，“三不易”大体上说因为时间的推移造成习俗的改变、译者才智远不如原经的圣人作者、译者态度精力上的不足等三个方面导致翻译很不容易。道安主张直译，他说，他所监译的经卷，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的翻译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

比道安稍晚的鸠摩罗什（350—409）从小熟悉梵文胡语，十几岁就通晓佛经，主持翻译的佛经多达 400 多卷。主张“意译”，其译文不拘原文体制，变通达顺。但其意译并非没有节制，依然“务在达旨”，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鸠摩罗什倾向于“不可译论”。他说，改梵为秦，“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嚼饭与人”的妙喻，即出于此。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大举兴佛，开启了佛教发展的新高峰。玄奘（600—664），通称“唐三藏”，“三藏法师”，俗姓陈，名炜洛阳人，13 岁即落发为僧。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年）冲破官府的重重阻挠，西去印度学佛求经。17 年间，刻苦学习梵语与西域语言，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对佛学研究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十九年（645 年）学成回国，带回梵文经书 657 部和大量佛物，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立即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建立译场，潜心翻译佛经，传布佛学要义。19 年共译经 75 部，1335 卷，占唐代新译佛经半数以上。同时还将《老子》、《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他主持的译场有完备的组织，特别注重译文的检查和修改，即使现在来看也是十分科学的，因此成为后世译场的楷模。据后人研究，玄奘的翻译熟练地运用了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代词还原法等技巧，但其本人对翻译理论却鲜有论述，目前能见到的只有记载于《大唐西域记》序言中的“五不翻”观点，即五种音译的情况。音译即不翻之翻。五种情况是：咒语之类的神秘语，多义词，中国无对应物的词语，通行已久的音译，以及为弘扬佛法需要的场合。尽管“五不翻”主张精到全面，但与玄奘在翻译实践上取得的成就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

玄奘以后，佛教活动逐渐走向平淡，以潜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佛经翻译日趋衰落。北宋译经尚有余响，南宋以降则几近销声匿迹了。

## 第二个时期

从 16 世纪初叶起，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主义者就开始相继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海盗掠夺。与此同时，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进行宗教活动，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前后持续近 200 年时间，这些传教士的使命就是向东方进行宗教扩张。在传教的同时，他们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翻译了一些

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并对中国以外的事物有了感性的认识。这一时期，首推意大利人利玛窦与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利玛窦，意大利传教士，学习过汉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外表儒雅，会说中国话，熟知“四书”、“五经”，1583年来中国后，很快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打开了新的局面。徐光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和科学文化的领导者，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翻译家。他认为，科技翻译就是吸取别国多年积累的科技成果，尽快地为我所用，以此壮大自身。利玛窦还与另一些近代科学的先驱人物如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天文、历算和其他自然科学的书籍。1857年英国人伟列亚力与著名翻译家李善兰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后九卷，延续了几乎中断200年的科技翻译。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共翻译西书437种，其中宗教书籍251种，自然科学书籍131种，人文科学55种。这些科学书籍对于普及西方科学知识，促进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第三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指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这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翻译的主体发生了变化。第一个翻译的重要时期的翻译主体多是西域高僧，第二个时期是耶稣会传教士，第三个时期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在甲午战争后更加明显。自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强国，加强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政府开办了不少外语学校，同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像京师同文馆就设有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后增加德文馆，成为我国第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专门学院。而后又有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方言馆。此外，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也设有外语专业和外语课程，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同时，还有一大批留学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学生也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的主体。

这一时期的翻译，除个别几人合作，如典型代表人物林纾外，绝大部分的翻译均脱离了合作的方式而由个人独立完成。其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文学翻译作品。从近代翻译的历程看，首先是科学翻译，而后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后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虽来得较迟，却对我国的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觉醒，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机器制造。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算学、测量、水陆兵法、天文学、化学、力学、文学、医学、汽车制造等书。据统计，近代早期最大的翻译机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163种著作中自然科学译书就占80%以上。

19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1872年夏末，在陈兰彬带领下，第一批30名学生赴美国深造。这些人通过在国外的考察、学习，深感西方之强大，并非完全在于枪炮和科学的发达，还在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于是着手翻译此类书籍。其中以严复为代表，他先后翻译了十多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著作，最有代表性的为八大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天演论》影响极大。甲午战争后，文学翻译继续涌现。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揭开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初，文学翻译走向繁荣。综观近代翻译史，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仍然首推严复和林纾二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备受后人推崇，至今对译学理论研

究产生影响。林纾不懂外文，靠与口译者的合作，翻译了 160 余种小说，成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后有专门论述）。

五四期间，文学翻译成为主流，基本上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都有自己的译论主张和独树一帜的翻译家。文学研究会的茅盾、郑振铎从现实主义角度提出翻译为社会服务；创造社的郭沫若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强调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新月派的徐志摩、朱湘等在诗歌翻译上有突出贡献；由众多文艺流派整合而成的左联主张翻译为中国革命现实服务，注重唯物史观的文艺批评著作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翻译。这期间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当推鲁迅。他认为中国语言文字不足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直译策略，他还对翻译的宗旨、重译、复译、翻译批评等有过深入的论述。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是该时期甚至整个中国翻译史上的大事。朱生豪（1912—1944），大学毕业后不久，出于对莎剧的热爱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在战火中忍受着饥饿、疾病的折磨，耗尽心力，10 年间共译出沙剧 31 种半，在再译五种半即成全璧的情况下，终因重病含恨辞世。朱生豪精通英语，又有扎实的中国古典诗词功底，因此他译的莎剧质量极高，数十年来受到学界内外的好评。

#### 第四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呈现出别一番景象。翻译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强调为社会主义服务。迄止 1966 年的 17 年间，文学翻译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作品及亚非拉国家作品的译介为主。俄国古典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前苏联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都有译介，甚至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名家的作品几乎全部译出，翻译家有吕荧、刘辽逸、汝龙等。亚非拉文学翻译家有楼适夷、季羨林等。比较而言，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欧美作品的翻译着力不多，但也并非一片空白。英国文学方面，卞之琳用诗体翻译了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传达了莎剧的气势；张谷若翻译哈代的小说忠实准确，晓畅通达；还有朱维之译弥尔顿《复乐园》，查良铮译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法国文学方面，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赵少侯着重翻译莫里哀的喜剧，罗玉君翻译司汤达和乔治·桑的小说。德国文学翻译家有冯至、张威廉、钱春绮、傅惟慈等，基本上把具有世界影响的德语作品都译介过来了。翻译事业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沉寂之后，于改革开放中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大大拓宽了翻译的范围，提高了翻译的质量，规模之大、影响之广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次翻译高潮。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新时期各个文化领域的大发展。

第四时期的翻译理论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傅雷在 1951 年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中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这就是著名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标准。钱钟书 1963 年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化境”，从而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推向了顶峰。改革开放后，中国翻译研究在继续发展，不过思考的资源与灵感大都来源于西方，与传统翻译理论相去甚远了。

## 第二节 西方翻译史概述

《旧约·创世纪》中说，上帝创造了人，又因人类作恶多端，故发大洪水湮灭。大洪水过后，人们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一处平原，于是停下来修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上帝大惊，不悦，遂使人的口音变乱，彼此不通言语，无法进行交流，停止修塔，散居各地。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产生翻译的原始根源。

西方翻译理论，一般认为可分为五个时期，即：古代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代时期和现（当）代时期。西方翻译理论较之于中国翻译理论更加系统、全面，有较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发展脉络。

### 古代时期

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是《圣经·旧约》的希腊语译本。公元前 285 年，72 名渊博的希腊学者遵从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弗斯的旨意，聚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为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将希伯来语写成的《圣经·旧约》译成希腊语。历时 36 年方得以完成，称之为《七十子希腊文本》。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著名神学家哲罗姆（347—420）奉罗马教皇之命，成功地组织了《圣经》的拉丁文翻译，命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该译本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承认的为一圣经文本。西方翻译理论发源于公元前 1 世纪。古罗马帝国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发表了著名的《论演说术》。在这篇演说中他说：“我认为，在翻译时，逐字翻译是不必要的，我所做的是保留原文的整体风格及其语言的力量。因为，我相信，像数硬币一样地向读者一个个地数词，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按照他们的实际重量支付给读者。”“按实际重量支付”即“保存原文的全部意义”。这段话首次谈到了直译和意译，明确提出反对逐字的翻译。这个时期，翻译家们大都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对翻译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集中在直译还是意译这类问题上。奥古斯丁是与哲罗姆同时代的神学家、哲学家，对翻译理论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翻译有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其选用取决于读者的需求。他从亚里士多德的“符号”理论出发，认为忠实的翻译就是能用译入语的单词符号表达源语单词符号指示的含义，即译语词汇和源语词汇具有相同的“所指”。他这套理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 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时期即西罗马帝国崩溃至文艺复兴时期。英国阿尔弗烈德国王（849—899）是一位学者型的君主，用古英语翻译了大量的拉丁语作品，常常采用意译法，甚至近于创作。11、12 世纪，西班牙中部地区的托莱多形成了巨大的“翻译院”，主要内容是将阿拉伯语的希腊作品译成拉丁语，接续欧洲断裂的文化传统。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语翻译，促成了民族语的成熟。英国的乔叟翻译了波伊提乌的全部作品和薄伽丘的《菲洛斯特他托》等，德国的维尔翻译了许多古罗马作品，俄国自基辅时期起翻译了不少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其著名的翻译家有莫诺马赫、雅罗斯拉夫等。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马神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曼里乌·波伊提乌。他提出翻译要力求内容准确，而不要追求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文艺复兴时期

从 14 世纪至 17 世纪初,西方翻译进入繁荣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和有影响的翻译理论。英国翻译题材广泛,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著作,无所不及。查普曼先后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宏伟壮观,成就卓越。他认为:翻译既不能过于严格,亦不能过分自由。人文主义者廷代尔,以新教立场翻译《圣经》,面向大众,通俗易懂,然又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的翻译触犯了当时的教会权威。1535 年,教会以信奉宣扬异教的罪名将廷代尔处以火刑。荷兰德是英国 16 世纪最著名的翻译家,题材多样,尤以历史翻译见长,著名作品有里维的《罗马史》,绥通纽斯的《十二恺撒传》等。法国的阿米欧于 1559 年翻译了《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内容忠实,文笔清新自然。他主张译者必须充分理解、透彻原文;译文要淳朴自然。语言学家、人文主义者多雷在其《论如何出色地翻译》中提出了翻译的基本准则:译者要完全理解翻译作品的内容;要通晓所译语言;语言形式要通俗;要避免逐字对译;要注重译文的语言效果。德国主要有路德的《圣经》翻译,遵循通俗、名了、大众化的原则,在官府公文的基础上吸收了方言精华,创造了本民族普遍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为德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认为,翻译必须采用平民化的语言;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路德之所以能在翻译实践上取得成功,是和他的理念分不开的。德国另一位代表人物伊拉斯谟认为,翻译必须尊重原作;译者必须要有丰富的语文知识;必须保持原文的风格。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对翻译的认识和讨论十分热烈,由此奠定了西方译学的理论基础。

### 近代时期

从 17 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时期是西方翻译的黄金时期。1611 年,英国出版了《钦定本圣经》,译文质朴典雅,音律和谐,是一部罕见的翻译杰作。不久,谢尔登译出了塞万提斯《堂吉珂德》。蒲伯在 1715~1720 年在查普曼的基础上重译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莪默·伽亚谟的波斯语作品《鲁拜集》于 1859 年有了第一个英语译本,后几经修订,跻身于英国翻译史上最优秀的译作之列。法国 17 世纪文坛盛行古典主义,因此翻译以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主;18 世纪,向往古老神秘的中国,翻译了不少中国作品,元曲《赵氏孤儿》的就是这个时期译介到法国的;19 世纪以西方各国文学的翻译为特色,莎士比亚、歌德、但丁、拜伦、雪莱的许多作品都有了法语译本。这个时期的翻译理论较为全面、系统、具有普遍性。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约翰·德莱顿,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法国的夏尔·巴托。德莱顿对翻译做了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掌握原作的特征,服从原作的思想,翻译的作品要考虑读者的因素。同时还对翻译分为三大类,即:逐字译、意译和拟作。泰特勒在 1790 年撰写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1)译作应完全复制出原作的思想;(2)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与原作保持一致,(3)译作的语言应具备原作的通顺。进入 19 世纪,德国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代表人物有:神学家、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施雷格尔,语言学家洪堡。翻译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就语言和思想方面对原文的理解,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和翻译术语,从而把翻译研究从某一具体篇章中抽象分

离出来，上升为“阐释法”。这种方法由施莱尔马赫提出，施雷格尔和洪堡加以发挥。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一文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的类型、方法、技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在19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作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1）翻译分为笔译和口译；（2）翻译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3）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4）翻译有两条途径，一是尽可能忠实于作者，另一是尽可能忠实于读者。洪堡进一步认为：语言决定思想和文化，语言差距太大则相互之间不可翻译，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一种辩证关系。洪堡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论述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受到极大的破坏而驻足不前，这期间几乎没有有影响的翻译和译论研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则在西方迅速恢复并很快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 现当代时期

西方现当代翻译理论时期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一时期在翻译范围、形式、规模和成果方面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翻译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亦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时期，由于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理论研究被纳入语言学范畴，带有较为明显的语言学色彩；同时，由于在理论研究中文艺派的异常活跃，又使翻译理论研究带有明显的人文特征。所以，翻译理论的研究大都走科学与人文结合的路子。而且，翻译研究更加重视研究翻译过程中所有的重要因素，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因素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产生的相互影响，并以此解决翻译中的各种问题，使翻译这门学科具有较为成熟的学科特征。

现（当）代翻译理论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成绩卓著的人物，并逐渐形成了流派。主要包括：布拉格学派、伦度派、美国结构派、交际理论派。或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美国翻译研究班学派、文学—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社会符号学派。这些学派的研究使西方翻译理论逐渐形成体系，趋于成熟。

## 第三节 翻译的本质

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翻译家对翻译情有独钟，对翻译的本质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精彩的论述，深化了对翻译的认识。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吉卜林说：“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例如不少人将翻译与绘画相提并论，有道是“隔行不隔理”。一代丹青大师齐白石老先生就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老先生著名的“化境”论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既不因语文差异而露生硬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无独有偶，威切斯勒将翻译家与音乐家相比较，认为翻译家和音乐家是同一性质的，他们都把别人的作品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再现给人们。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也

曾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而泰德勒则将翻译比喻为复制一幅画。画论译理，灵犀相通，可见齐白石老先生所论实在是至理名言，之于翻译实则精妙的法则：翻译作品不可“不似”原作，如“不似”原作，则决然不是翻译；翻译作品不可“太似”原作，如“太似”原作，又如何能称为艺术？只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才能既是翻译，又是艺术。

19世纪以来，不少人开始以传统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翻译问题，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或是把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在保持其内容即意义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连贯性话语的过程。进入当代，受当代语言学的影响，人们把研究的视点从语言本身扩展到交际语境、语域、语用等范畴，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美国语言学家、翻译家 E.A.Nida 是交际翻译观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从语义到文体再现原文的信息。

在过去十年，以文化研究为重点的翻译研究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认为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的产物，并反过来推动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使一国的文化为别国所共享，所借鉴，从而促进各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创新。这一时期，不少西方学者使用“跨文化”来形容翻译的这一活动。其中代表人物为科纳切尔，他就明确提出“跨文化翻译”的概念，使翻译活动的层面与文化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不少人认为翻译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强调语言的创造功能，讲究译作的艺术效果。如拉斐维尔、兰伯特等人就认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重新摆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既是模仿，又是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实用主义者从翻译的现实成分出发，把翻译看作是客户委托做的工作。中国香港的周兆祥先生就认为：翻译工作不是什么超然于社会之外的艺术，而是配合社会发展需求而提供的雇佣兵式的服务。他说：译者的主要责任，不是译好某些文字，而是为了委托者的最大利益，完成当次委托的任务。罗宾逊也谈到：不同的人对翻译有不同的看法，不做翻译的人视其为文本处理，译者则视之为一种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的争论和论述还集中在翻译作品“可译”与“不可译”上，使之成为一个古老的悖论，为人们提出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一方面，人们认为翻译为人们的沟通和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作家、思想家、翻译家对翻译的真实性又表示怀疑。例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神学家但丁（1266—1321）就提出“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观点，他始终认为“翻译将破坏全部的优美和谐”。他说：“任何富于音乐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则形象地将翻译比喻为“反面观赏弗兰德斯的花毯”（又译：佛拉芒毯），图案轮廓固然清晰，但色彩却不见了。他在其长篇小说《堂吉珂德》中借主人公堂吉珂德的口这样说道：“不过我对翻译也有个看法，除非原作是希腊、拉丁两种最典雅的文字，一般的翻译就好比弗兰德斯花毯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却不见了，至于相近的语言，翻译只好比誊录或抄写，显不出译者的文才。”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说：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德国语言学家施来格尔更为直接：翻译好比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斗，最后失败的不是译者就是原作者。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一语惊人：翻译好比女人，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英



国诗人雪莱也说：译诗是徒劳的，犹如将紫罗兰扔进坩埚里。彼得·纽马克对翻译的比喻非常的实际，他比喻说“许多翻译都是在一种方案与另一种方案之间的妥协。翻译是一种变戏法的动作，是一种碰运气的事，是走钢丝。无论对译者或者对翻译批评者而言，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对已翻译的东西改变注意或看法。”

德国翻译家洪堡也就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发表了两元语言观。他指出：“所有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块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贴得太紧而牺牲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近本族特点太紧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是难于找到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但是他又说：“在任何语言中，甚至不十分为我们所了解的原始民族的语言中，任何东西，包括最高的、最低的、最强的、最弱的东西，都能加以表达。”

不难看出，翻译既是难事，但又十分精彩。有趣的是，人们在论述翻译时都力图将翻译与丰富的色彩和鲜明的个性相提并论，这充分说明翻译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广阔。我们曾在翻译课中就同一作品的多种翻译为学生作比较时谈到：不同的译者的文化背景、个性特质、社会表征等多种因素决定了他对翻译作品的理解和翻译的风格确定，这些东西体现在译作中使之产生差异并对读者产生影响，有时候概括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译作对读者的影响富有社会责任。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并传递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甚至细微的语言特征，这确实很难把握并且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说译作好或不好，同样和我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人特质有关，并且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十分密切。有人一生中翻译了很多作品，却很少有产生影响的；有人一生中只翻译了一部作品，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甚广；有人因译作名声大燥；有人的译作成为经典而自己却鲜为人知。由此提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谁来从多种因素出发比较和认定译作的忠实和好坏？以《简爱》为例，译本有二三十种，可以说除了译者特定的生活时代的一些烙印表现在译文中以外，应该说都各有千秋。然而，就整体而言，究竟谁最大程度忠实于原作，传递出原作的思想和风格，有谁愿意去做精准的比较和论断？

其实，翻译之精彩足以让我们以严肃的态度和宽阔的胸怀来认识和理解原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承载的文化和社会责任。《圣经》的译者对翻译所做的比喻说：“翻译就是把窗户打开，让光线进入房间；翻译就是把贝壳撬开，这样我们便可以品尝里面的肉核；翻译就是撩开窗帘，这样我们便能窥见最圣洁的地方；翻译就是打开井盖，这样我们便可获得水源”。德国最伟大的文豪歌德（Goethe, 1749—1832）把翻译家比作“媒人”，他说：“翻译家应被看作是忙碌的媒人。他对一位还半遮着面的美人加大赞誉，说她真值得我们倾心。媒人就这样激起了我们对这位美人的爱慕，一定要对她本来的长相看个究竟。”美国女翻译家马格利特·佩顿借用自然科学对物质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的描述对翻译作了十分新颖的精彩比喻。她说：“我喜欢把原作想象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冰。翻译的过程就是这块冰溶化的过程。待到变成了液体状态时，每个分子都变换了位置，没有一个分子与其他的分子再保留着原来的关系。它们开始了在第二种语言里形成作品的过程。分子有逃逸掉的，新的分子涌了进来填补空缺，但是这种成型和修补的轨迹完全是隐性的。在第二语言里确立起来的译作是一块新的方方正正的冰块，它虽与原来的冰块不同，然而外表看上去却是一模一样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赫尔德（1744—1803）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理：译作与原作不可能完全划等号。他说：“一种语言在未被翻译之前就如同是一